

晚明大變局

樊樹志 著

中華書局

晚明大變局

樊樹志 著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明大变局/樊树志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8
ISBN 978-7-101-11100-2

I.晚… II.樊… III.中国历史-研究-晚明 IV.K248.3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6994 号

书 名 晚明大变局

著 者 樊树志

责任编辑 贾雪飞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32

印张 16¼ 插页 3 字数 400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100-2

定 价 58.00 元

目 录

引言	1
第一章 “海禁一朝贡”体制的突破	9
一 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	10
1. 严禁“交通外番,私易货物”的海禁政策	10
2. 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	13
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	17
1. 日本的朝贡关系	17
2. 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	22
三 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	26
1. 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	27
2. 海禁的突破口:月港与双屿港	30
3. 朱纨的悲剧: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	34
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	38
1. 何谓“嘉靖大倭寇”	41
2. 倭患与真倭、假倭	50
3. “市禁则商转为寇”,“禁愈严而寇愈盛”	57
五 王直之死与海禁的开放	59

1. 胡宗宪招抚王直	59
2. 王直其人其事	61
3. 开放海禁之议	68
4. 月港贸易合法化与广中事例	77
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	81
一 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	84
1. 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	84
2. 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	88
3. 从香山澳到濠镜澳	91
二 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	94
1. “东方第一商埠”——澳门	94
2. 澳门—果阿—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	98
3. 澳门—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	99
4. 澳门—马尼拉之间的远程贸易	101
三 尼古拉·一官与“海上马车夫”	103
1. 泉州海商李旦	103
2. 尼古拉·一官——郑芝龙	105
3. “海上马车夫”——荷兰东印度公司	107
4.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、日本的贸易	110
四 “马尼拉大帆船”与太平洋丝绸之路	114
1.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西班牙人东来	114
2. 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	119
3. 从月港到马尼拉	123
4. 从澳门到马尼拉	126
5. 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	128
五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	132

055	1. “商业上的‘纳贡’”	132
565	2. 全汉昇：美洲白银的 1/2 被运到中国	136
572	3. 弗兰克：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 1/4 至 1/3	140
125	第三章 江南市镇：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	145
245	一 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	147
643	1. 从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到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	147
225	2. 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何时形成？	148
505	3. 江南的乡村工业化	154
579	二 晚明：江南市镇的迅猛发展时代	156
282	1. 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典型分析	156
285	2. 江南市镇的规模与结构	160
292	三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	165
206	1.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	166
152	2. 丝绸业市镇的经营方式	171
552	3. “有力者雇人织挽，贫者皆自织”	177
258	四 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	181
122	1. 乌泥泾与黄道婆	181
202	2. “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”	185
242	3.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	189
142	4. 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	199
918	5. “土布出洋”一瞥	206
122	五 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	208
122	1. 社会风尚由俭入奢	208
521	2. 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	211
162	3. 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	218
172	六 余论	225

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潮流	229
一 陈献章：“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”	232
1. “江门心学”的怀疑精神	232
2. “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”	234
3. 陈门弟子：从贺钦到湛若水	239
二 王守仁：“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”	243
1. “学贵得之心”	243
2. 贬谪龙场：“动心忍性，恍若有悟”	253
3. “功高而见忌，学古而人不识”	262
4. 漫长的昭雪之路	273
三 “掀翻天地”的王门弟子	288
1. “不从人脚跟转”的王畿	288
2. “六经皆注脚”的王艮	298
3. “非名教之所能羈络”的颜山农、何心隐	305
四 李贽：“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故未尝有是非”	321
1. 赞扬王门弟子“一代高似一代”	322
2. “假道学以异端目我”	325
3. “快口直肠，目空一切”	331
4. “不死于人，死于口；不死于法，死于笔”	335
5. “先生起千载，高言绝群智”	344
第五章 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	349
一 耶稣会士东来：利玛窦的前辈	351
1. 依纳爵·罗耀拉与耶稣会	351
2. 澳门：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通道	352
3. 沙勿略神父：向中国传教的创始人和发起者	354
4. 范礼安神父：中国传教事业之父	357

5. 罗明坚神父：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	359
二 利玛窦神父的“本土化”传教活动	361
1. “但求人与我同，岂愿我与人异”	361
2. 《交友论》：“东海西海，此心此理同也。”	365
3. 《天主实义》：“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。”	367
4. “登上了‘月球’”	370
5. 为传教士们留下了敞开功德之门	374
三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	381
1. 《山海輿地全图》与《坤輿万国全图》	382
2. 《几何原本》、《同文算指》与《圜容较义》	387
3. 《奇器图说》与《泰西水法》	392
4. 《崇祯历书》	397
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	402
1. 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	402
2. 可以与托马斯·莫尔媲美的徐光启	406
3. “以西法为宗”的李之藻	412
4. 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杨廷筠	416
5. “读书必开眼”的方以智	423
第六章 新气象：文人结社与言论	433
一 “虑圣教之将绝”的应社	435
1. 文人结社之风由来已久	435
2. 应社与广应社	437
3. “尊经复古”	440
二 “负韬世之才，怀救时之术”的几社	443
1. “十人社”、“六人社”与“十八子社”	443
2. “绝学有再兴之几”	445

3.	剖析朝政利弊的《几社壬申合稿》	447
4.	“关于军国,济于时用”的《皇明经世文编》	454
三	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	462
1.	复社的尹山大会、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	462
2.	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	470
3.	甚嚣尘上的攻讦	482
4.	复社的理想政治——吴应箕的个案	493
5.	《留都防乱公揭》	499
6.	报国无门的悲剧	505
四	余论	507
后记	513

引 言

撰写《晚明大变局》这本书，并非心血来潮。大约十年前，我在《解放日报》的学术版发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，题为《晚明的大变局》，主旨是：近来人们常说“晚清的大变局”，殊不知，晚明也有大变局。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但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反响，于是我立志要写这样一本《晚明大变局》。这十年间，阅读、收集各种史料，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增补自己已有的认知，逐渐集中于六个问题，也就是诸位现在看到的，本书的六个章节。从各章的标题可以约略看到各个方面的“大变局”：“海禁一朝贡”体制的突破；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；江南市镇：多层次商品市场的高度成长；思想解放的浪潮；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；新气象：文人结社与言论。

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，而是有世界背景的，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。

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，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，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，或大航海时代。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，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；越过大西洋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。这些发现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西方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。这一转折，最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全球化”初露端倪。从此，人类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，而是全球各大洲；人类的视野不再是半个地球，而是整个地球。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。

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，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、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，以及香料群岛，从 1524 年（嘉靖三年）起，

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。当他们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后,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交往的商埠,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。澳门—果阿—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,澳门—长崎贸易,澳门—马尼拉贸易,输出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,输入以白银为主的外国商品,人们概括为“丝—银贸易”。

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,绕过美洲南端,横渡太平洋,来到菲律宾群岛。1580年(万历八年)以后,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,为生丝、丝织品、棉布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往墨西哥的贸易航路——太平洋丝绸之路,这就是驰名于历史,持续两百年之久,沟通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。声名远扬的“马尼拉大帆船”,运去的是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,运回的是墨西哥银元。

无论是葡萄牙、西班牙,还是后来的荷兰,在与中国的贸易中,始终处在逆差之中。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《白银资本》中所说:“外国人,包括欧洲人,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,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‘纳贡’”;“‘中国贸易’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,中国凭借着在丝绸、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,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。因此,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,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,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、西亚、印度、东南亚输入中国,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。”根据他的研究,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,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,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,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,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。有的学者认为,通过贸易渠道,全世界白银的一半最终流入中国。不管具体数据有什么差异,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流入中国是确凿无疑的,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,它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。

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,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依然沿袭着

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，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商人贸易。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，贸易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冲击这条禁令，东南沿海走私贸易非常兴旺。走私与海禁较量的结果，终于使得统治集团明白，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，海禁政策已经不合时宜。隆庆元年(1567)，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，请求朝廷开放海禁，准许人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。朝廷权衡利弊得失之后，批准了这个建议。在东南沿海的港口，设立海关，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征收关税，使得“私贩”转化为“公贩”，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。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，显示了晚明时代对外开放的胸襟。

各种力量的作用，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。正如全汉昇所说：“中国的丝织工业，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，技术比较进步，成本比较低廉，产量比较丰富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，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，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。因此，当西班牙帝国自欧洲本部扩展至美洲和菲律宾后，中国丝货的输入美洲，竟引起西班牙国内丝织业者与海外殖民者间的严重冲突。这一事实告诉我们：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，中国工业的发展，就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，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辉灿烂的历史。”

而创造这一页光辉灿烂历史的正是晚明的江南，具体地说，是江南的丝绸业市镇。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，其四乡以出产一生产优质生丝而闻名于世，统称为“湖丝”，它的著名品牌“辑里丝”(七里丝)，就是以南浔镇的辑里村(七里村)为中心的地区出产的“湖丝”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，成为各国商人争购的抢手货。用这种“湖丝”织成的各色绸缎，也是行销海内外的名牌产品。或者从福建的月港销往马尼拉，再由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，运往美洲；或者从澳门销往印度的果阿，再转销欧洲。外销商品中，仅次于丝货的棉布，主要产地也在

江南,江南的棉布业市镇出产的精品棉布,号称“衣被天下”,不仅行销全国,还远销海外。1580年代至1590年代,中国商人运往马尼拉的商品,排在首位的是生丝、绸缎,其次就是棉布、夏布。中国的棉纺织品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,早在16世纪末,中国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。1600年,从澳门开往日本长崎的葡萄牙商船运去3000匹棉布,见于博克瑟(C. R. Boxer)的著作。其实,中国的徽州海商,早已从宁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。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(1562)的《筹海图编》就已记载,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,第一位是生丝,第二位是丝绵,第三位就是棉布。而这些棉布的产地就是江南的棉布业市镇。

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,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,通过澳门这个渠道,进入中国。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,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,不仅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,“西学”以前所未见的巨大魅力,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士大夫们,短短几年,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。无怪乎西方学者把利玛窦称为“科学家传教士”,中国士大夫则把他叫作“西儒利氏”。

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说:“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,晋、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,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。”佛学传入对于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,人所共知;而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可以与之媲美,或许更胜一筹,使得中国人看到了欧洲先进的天文历算、数学物理、农田水利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新知识。

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,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,涌现出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:瞿汝夔、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、王徵、方以智等,他们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各种欧洲科学著作,向国人普及新的科学理念,一时间钻研西学蔚然成风。裴化行神父在《利玛窦神父传》中说,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,其先锋“并不是出国考察

者,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,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,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”。他推崇瞿汝夔“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统引入远东世界”;赞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《几何原本》的徐光启,可以和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的代表人物托马斯·莫尔相媲美。徐光启起用耶稣会士修订历法,编成《崇祯历书》,吸收欧洲先进的天文学知识,使中国传统天文学转型,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宇宙的新阶段。李之藻把利玛窦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刊刻出版,并且加上许多文字说明,打破了中国传统的“天圆地方”的观念,让中国人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圆球,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。从艾儒略的《职方外纪》,人们知道了地球上五大洲,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,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。

崇祯五年(1632)浙江宁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国与欧洲相比较,感慨系之:“天载之义,格物之书,象数之用,律历之解,莫不穷源探委……则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”;“自鸣之钟,照远之镜,举重之器,不鼓之乐,莫不精工绝伦,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”;“土地肥沃,百物繁衍,又遍贾万国,五金山积,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”。人们在惊讶之余,不能不反思,以老大自居的天朝,应当急起直追了。

西学东渐的成功,还得归功于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接受氛围。周振鹤教授说,此次天主教来华的运气比较好,客观环境正处于晚明“天崩地解”时代,有利于基督教义的传播。王阳明心学的兴起,大大解放了读书人的思想。思想愈解放,就愈需要新的资源。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,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。晚明的中国大环境让传教士们感觉到如鱼得水。

王阳明思想的精髓,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:“夫学贵得之心,求之于心而非也,虽其言之出于孔子,不敢以为是也。”他认为,学问是天下的公学,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,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,拒绝拜

倒在圣贤和经典的脚下。明中叶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，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注释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，士子们没有自觉、自由的思想。王阳明的大声呼喊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。此后，人才辈出，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，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的思潮。

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，把师说发扬光大，主张学贵自得，“不从人脚跟转”。王门的另一大弟子王艮，高唱“六经皆注脚”。所谓“六经皆注脚”，顾宪成把他解释为“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”。从儒家经学的正统立场来看，这显然是大不敬。但是那种“原教旨主义”，使得人们的思想僵化，只知背诵教条，人云亦云。要想打破牢笼，自由思想，“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”是必然的选择。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，不断赋予新的解释，为我所用。王门后学宣扬“不从人脚跟转”、“六经皆注脚”，被正统派视为“非圣人之道”，斥为“异端”。王艮反唇相讥：“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，凡有异者，皆谓之异端。”与“非圣人之道”的衡量标准唱反调，主张“百姓日用”才是衡量是否“异端”的标准。李贽也被贬为“异端”，他的应对策略更为巧妙、机警，扬言说，既然假道学把我看作“异端”，索性以“异端”自居，我行我素。他著书立说，大胆地责问：为什么千百年来无是非？答案只有一条：“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故未尝有是非”。振聋发聩，令思想界“莫不胆张心动”。

冲破思想的桎梏，挣脱名教的牢笼，思想解放的浪潮滚滚而来，思想界流派纷呈，讲学之风盛行，互相辩驳诘难。有了这样的氛围，使得西方科学文化得以顺利地传播、弘扬，培养出了一大批放眼世界的先进中国人。

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。

更多的士子、文人有了自主意识，文人结社蔚然成风。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，涌现出许多文社，其中以常熟的应社、松江的几社和

活跃于江南的复社最为有名,影响所及,遍于全国。学人们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,畅所欲言地交流心得,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,成为晚明社会一道明丽的亮色。复社鼎盛时期,拥有三千多成员,遍布全国各地,主要集中于太湖周边的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嘉兴、杭州、湖州等最为富庶的七府之地(有一千二百多人),其中又以苏州府为最多(有五百多人)。崇祯六年(1633)春,复社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,盛况空前,陆世仪《复社纪略》写道:“先期传单四出,至日,山左、江右、晋、楚、闽、浙,以舟车至者,数千余人。大雄宝殿不能容,生公台,千人石,鳞次布席皆满,往来丝织。游于市者,争以复社会命名,刻之碑额。观者甚众,无不诧叹: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!”岂但三百年来所未有,此后也不曾再有,简直是空前绝后,令人叹为观止。

德国学者耶格尔(Friedrich Jaeger)在《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》中,意味深长地指出:“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,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。”提出晚明的大变局,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,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,回过头去看一看 16 世纪至 17 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,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,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,都有莫大的好处。

